

清代海外游历笔记中的华侨社会

沈燕清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清代; 海外游历笔记; 海外华侨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清代一些较重要的海外游历笔记, 并通过这些游历笔记来研究清代海外华侨社会的基本状况, 以此突显其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 K82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 (2005) 05-0048-05

清朝是我国华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 华侨出国合法化, 加上西方殖民者因开发东南亚及其它殖民地而产生的对劳动力巨大需求的推动, 华侨出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此同时,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对华侨的政策也由漠视与敌视转变为重视与利用, 派出不少官员出访南洋各地及世界其他地方, 或派出关注华工情况的考察团, 甚至设立领事馆直接保护华侨。一些华侨或外派官员将自己的所闻所见记载下来, 即成为所谓的海外游历笔记, 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较完整与真实的海外华侨社会的历史画卷, 成为研究清代海外华侨社会的重要史料。

一、清代主要的海外游历笔记及其价值浅析

清代的海外游历笔记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 清政府外派官员或驻外使节的出访日记

晚清时期封建政权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由一贯的排斥、歧视转变为保护与利用, 晚清政府的官员开始较多地任驻外使节或出访。从1876年清政府开始向外国派驻使臣开始, 清政府就明文规定, 出使各国大臣“凡舟车之程徒, 中外之交涉, 大而富强立国之要, 细而器械利用之原, 莫不笔之于书, 以为日记”^[1]。而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总理衙门咨行“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一片则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 及各国风土人情, 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 随事咨报”, 目的是使“数年以后, 各国事机, 中国人员可以洞悉, 不至漫无把握”^[2]。清政府对外派人员游历笔记的重视, 使得这些资料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成为今天研究清代华侨历史的重要史料。

由外派官员或驻外使节所写的游历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榷棧笔记》: 作者斌椿, 同治年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知, 同治四年(1865年)奉命随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前往法、英、俄、德等国游历, 采访风俗, 将经历辑录下来而成此书, 该书记载了有关越南、新加坡等地华侨生活的情况。

[收稿日期] 2005-10-08

[作者简介] 沈燕清, 女,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航海述奇》:作者张德彝,清代职业外交官、翻译官,分别于同治五年(1866年)随同斌椿游历欧洲各国和光绪二年(1786年)随同郭嵩焘、刘锡鸿出使英国。该书记载了越南、新加坡、槟榔屿及欧美各地华侨生活的情况。

《使西纪程》:即《伦敦与巴黎日记》,作者郭嵩焘,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曾任新加坡领事。1875年因为马嘉里事件被派往英国请罪,同时还被派往法国交涉。该书记载了新加坡、槟榔屿华侨的基本情况。

《出使四国日记》:作者薛福成,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光绪十五年(1889年)奉命出使英、法、义、比四国。该书记载了东南亚各国及澳洲、拉美等地华侨情况及清政府在新加坡设领事的经过。

《初使泰西记》:作者志刚,曾随美国驻华公使、清朝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出使美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即德国)、俄国等。该书涉及日本、美国及拉美华侨的一些情况。

《环游地球新录》:作者李圭,光绪二年(1876年)曾负责运送中国展品到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他将途中见闻辑录成书,该书涉及日本、美国华侨的一些情况。

《归国日记》:作者王咏霓,清朝职业外交官,曾游历欧美、日本等。该书记载日本华侨一些情况。

《古巴杂记》:作者谭乾初,曾作为翻译随同陈兰彬出使美国、日本、秘鲁三国;1879年任清朝总领事。该书记载了19世纪40到80年代古巴华工“猪仔”的情形。

《新加坡风土记》:作者李钟珏,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该书记载了新加坡地理特产、风俗习惯及华侨的一些情况。



▲ 1902年郭容在日本留学的照片
(本刊资料)

《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回国后曾率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该书记载美国、秘鲁华工的一些情况。

《客韩笔记》:作者许寅辉,清朝驻韩官员,该书记载了19世纪末旅韩华商的情况。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作者曾纪泽,清末外交官,曾任出使俄国、法国、英国大臣。该书涉及英、法、俄等国华侨状况。

《三洲日记》:作者张荫桓,曾任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十一年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该书涉及美国、秘鲁等地华工、华侨情况。

《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作者崔国因,晚清学者、外交家,曾任清政府驻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秘鲁三国外交官员。该书涉及近代中外交流及美国、秘鲁等地华人情况。

《出使九国日记》:作者戴鸿慈,曾任户部侍郎,1905年参加以载泽为首的四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团,其中戴洪慈与湖南巡抚端方赴美、德、意、奥访问,该书涉及美国华工的一些情况。

《英轺日记》:作者刘锡鸿,清代职业外交官,曾随同郭嵩焘访问英法等国。该书记载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华侨情况。

《使美纪略》:作者陈兰彬,光绪四年曾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1873年率团赴古巴调查华工状况。该书记载华侨在美国的一些情况。

此外如蔡钧的《出洋琐记》、邹代钧的《西征记程》、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徐建寅的《欧游杂录》、丁韪良的《旧金山记》、阙名的《游历笔记》、袁祖志的《瀛海采问纪实》、蔡尔康的《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王之春《使俄草》、黎庶昌《西洋杂记》、李筱圃《日本纪游》、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纪》、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清代海外华侨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清代华侨历史可资利用的资源。

(二)由海外华侨如流寓者、游历者等根据亲身经历而写成的游历笔记

由清代海外华侨所写成的游历笔记主要有以下一些:

《巴游纪略》:作者陈洪照(1710-1773),该书介绍了南洋一带的交通、疆域及印尼的气候、贸易、人物和风土人情等,是研究清初南海交通史、华侨史

及印尼史地的重要史料。只是该书至今未见原本,惟在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中多处引用该书原文^[3]。

《海录》:作者谢清高(1765-1821年),广东嘉应州人(今梅县),18岁时随外轮出洋,在海外寓居14年。《海录》成书于1820年,该书的价值在于其比较详细地记载了18世纪后期华人在越南、暹罗、吉兰丹、马六甲等地垦殖、采矿和商业活动的情况。

《海岛逸志》:作者王大海,福建龙溪人(即今漳州龙海),1783年到爪哇,前后侨居10多年。该书详细记载爪哇及其周围岛屿、国家的山川、民族、物产、交通、风土人情和荷兰殖民统治及华侨的情状,大都为亲眼目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东南亚史、华侨史、中外关系史和荷兰殖民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4]。

《海国闻见录》:作者陈伦炯,厦门同安人,少时随从父亲在海上生活多年,曾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后调任广东、浙江等地任职,官至浙江水师提督。因其任所“所届悉任海疆”^[5]、“故以平生闻见著为此书”^[6],此书记载明末清初海上中外交往及东南亚华侨的一些情况。

如上所述,清代海外游历笔记或是由海外华侨依据亲身经历而写成,或是由清政府外派官员、驻外领事根据所闻所见而写成,因此它们与其它官修史书相比,具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1、它们的真实性较强,可信度较高

以《海国闻见录》为例,作者陈伦炯“先公少孤贫废,学贾往来外洋”^[7],因此陈伦炯从小随从父亲泛海生活,对沿海情形非常熟悉,其父死后,陈伦炯也担任清军将领,镇守广东沿海一带,因此1730年写成《海国闻见录》可称为“海疆要书也”^[8]。该书的价值在于其不仅对中国沿海形势进行详细的记载,并涉及到非洲、欧洲一些国家,对西方殖民者在南洋、东南洋、印度洋等地的扩张表示了关注与忧虑,是18世纪上半期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也是研究清代华侨历史的重要史料。

《海录》的作者谢清高“少敏异,从贾人走海南,遇风覆其舟,拯于番舶,遂贩焉。每岁偏历海中诸国,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阨塞风俗物产,十四年而后反粤,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9]。因此,《海录》一书是研究清代华侨历史不可或缺的史书。

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则是他“于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二日由上海起程,一路访察外洋

各埠情形,随所见闻,据实纂记。莅任以后,驰驱英法义比四国,又逐事考求,于各国形势,政事风俗,观其大略,编录成帙”^[10],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2、内容丰富,可弥补正史的不足

如《海岛逸志》的作者王大海“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泛海至爪哇,后居三宝瓏,赘于华人甲必丹家,衣食丽都,侍婢数十,终以家有老母,拂袖而归,依然舌耕度日”、“舌耕之暇,采风文俗,举诸番之胜概异壮,一一志之……至诸岛之风土人物,则纤悉备焉。是岂商人所能道其详而非海岛之实录哉!”^[11]该书内容极为丰富“举凡爪哇及其附近岛屿、国家的历史地理、航海交通、民族分布、农产物价、气候历法、宗教信仰、文字艺术、果树花卉、水陆动物、风土人情、荷兰在爪哇的殖民侵略与统治、贸易、银币、先进技艺、阳历、医药、容貌举止、服饰、生活、风俗习尚、本土气候乃至华侨历史、贸易经济、宗教信仰和生活情况等,靡不一一具载或涉及,可谓是200多年前爪哇及其周围地区的一部实录”,“是久居其地的华人全面真实记述200多年前荷兰殖民统治下爪哇及其周围岛屿、国家的第一本著作……是研究东南亚史、华侨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珍贵文献”^[1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价值在于它对美国华侨情况有极为详细的描述,这在清代官方史书中是不多见的。从美国华侨人数到分布、职业、华人社团、华人会馆、秘密会社到留学生等,以及华侨对维新运动的支持等无一不包括在此书内。书中更提出其独到的观点“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13],因为旧金山华侨是除了南洋地区外世界上最多的,所以颇具代表性^[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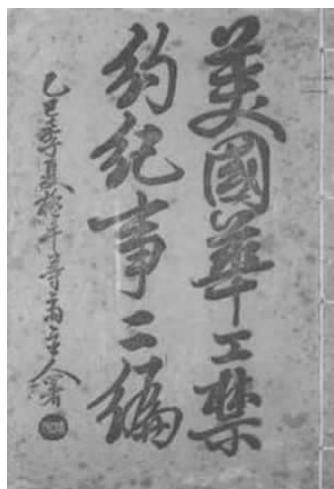
二、海外游历笔记所反映的清代海外华侨社会

从清代海外游历笔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较全面的认识此时期海外华侨社会的面貌。

(一)华侨人数大增,分布范围极为广泛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国,加上华侨在当地的繁衍,华侨人数大为增。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提到新加坡“其地华人贸易者,以六七万计”^[15]。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越南“西贡西南三四里,为中国城,地名‘超伦’,店铺亦多,

……售米经华商手者十之八九，故南圻米市之利，华商独擅之。法人论南圻事者，有‘舍粟米无出产，舍华人无生意’之说¹¹³⁰。



年出版。
美国华工禁约记事二编（1905
本刊资料）

一些游历笔记对西方殖民政权对华侨既招徕又限制、既分而治之又间接统治的统治方式有直接的描述。如《海国闻见录》中记载噶喇吧（即吧城）“原系无由来地方，为红毛荷兰所据……中国人在彼经商耕种者甚多，年给丁票银五六金，方许居住。中国人口浩盛，住此地何畜十余万。近荷兰亦以新唐禁革，不许居住，令随船而回¹¹³¹”。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记载吧城“流寓华人七万有余，多衣洋衣，隶荷属。荷择其贤能者为马腰、甲必丹等官，专理华人事务，而审断之权仍操自荷人¹¹³²”。张德彝《航海述奇》中记载新加坡“闻有八万余华人贸易于此，有华人黄浦者，为英国管理华人之官¹¹³³”。《海录》记载华人“居吉兰丹山顶淘金欲回中国者，至埔头，必先见王，纳黄金一两，然后许。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半。若‘甲必丹’知其贫，而为之请，则免。‘甲必丹’者，华人头目也¹¹³⁴”。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则对殖民政权对华侨社会与当地土著分而治之政策的弊端有直接描述，书中记载新加坡“此处居人共三十余万，中华及本土人最多。英就各要隘建炮台，戍以兵。设有税关，榷税颇轻。寄居界内华人，亦无他费。惟土人恒与华人冰炭，稍有睚眦，即思报复，华人每为其杀害，幸英官尚能拘究严禁之¹¹³⁵”。

华工是清朝华侨出国的主体，他们成为清政府及其外派官员关注的主要对象。容宏在《西学东渐记》中对华工在海外的悲惨遭遇有真实描述，书中《秘鲁华工之调查》一节详尽地描述了华工被拐骗、绑架，乃至登上“海上浮动地狱”及在目的地受尽非人待遇等等，更直接指出“秘鲁华工之工场，直一牲

立有二会馆。华商贩米出口者，不绝于道。闻西、超二处，居闽广人约二万。散居法属别埠者，尚约五万五千人¹¹⁶。谢清高《海录》中记载槟榔屿“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¹¹⁷、马六甲“闽粤人至此采锡贸易者甚众¹¹⁸”。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记载缅甸仰光“华人在此者三万有奇¹¹⁹”。

除东南亚外，华侨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对美国和日本华侨有诸多描述，书中记载旧金山“此间居人不过二十万，华人则居十之二。市肆繁盛，口岸开阔，商船亦多¹²⁰”。日本“长崎一岛，吾华为工商于此者，粤东约三百人，八闽三四百人，江浙百余人……较之本土易谋生¹²¹”。“神户、大坂两地，居民共约六万人，华人共七八百名，亦建有会馆，规模与长崎同¹²²”。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则较详尽地描绘了美国和加拿大华侨的情况。“大约我同胞在美国者，通计不过十二万人内外¹²³”。“计加拿大全属华人约二万，而哥伦比亚省居十之六七焉¹²⁴”。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则对以往华侨较少光顾的新金山即澳大利亚的华侨情况进行描述，“综核澳大利亚全洲，民人共三百六十七万二千有奇，华民旅居各地者共四万九千七百余人”，其中“雪梨（即悉尼）粤商二十九家，华人商工共四千，其在内地开店及种植者亦六千余¹²⁵”。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更罕有地记载了一位侨居法国十几年的华侨的情况：“午后，有中土宁波人王承荣字子显者来拜。伊在此娶妻，开设铺店，贩卖中华、日本货物，又解英法言，在此已侨寓十数年矣¹²⁶”。

（二）华侨在东南亚各殖民地辛勤劳作，为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各殖民政府一贯对华侨采取限制与排斥的态度，通过分而治之、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华侨社会，华侨的境遇十分悲惨。

清代海外游历笔记中多处提及华侨对侨居地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谢清高《海录》记载“中国至此（咭兰丹国）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沙，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¹²⁷”。槟榔屿“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¹²⁸”。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更直接地指出“南洋诸岛各埠林立，商务工务均赖华人为骨干¹²⁹”。如越南南圻“出产以米为大宗，商务亦以米为关键

畜场^{136]}。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欧美各地排斥华工现象有较详细的叙述：“白人之殖民地，除南亚美利加及南洋海峡群岛以外，几无一不限制华工^{137]}。如在美国“制靴、卷烟、织帛三业，惟旧金山有之，他处无有。此三业前此极盛，资本主亦华人，华裔以此致富者不少。后（美国）工党妒之甚，设种种法律相胁制，如吕宋烟非经政府盖印者不能出售，而政府于华工所卷者不盖印，是其例也……现此业日衰微，行将绝迹矣^{138]}。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亦有限制华工之例，前此每一人登岸，须纳税金一百元（美金），近则增至五百元，合中国通用银千余元矣^{139]}。”

（三）在海外派驻领事，是晚清侨务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海外设立领事是清政府对华侨态度与政策转变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最早提出在海外设立领事的是著名的洋务派实干家丁日昌，他在1867年的《上曾侯自强变法条陈》中，建议清廷派使节“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140]}。清代外派官员的游历笔记中也多次呼吁清政府在海外设立领事，如曾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则是清朝外派官员中倡议设立领事的先驱和直接推动者，他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提出“华民流寓者多，必得设领事管束^{141]}。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则表示：“三藩谢司戈（即旧金山）之华人，不容于爱党，岌岌可乎若在倒悬。新加坡之华人，伤毙于土人。若夫受害于古巴、秘鲁，更不能以数计。而其惨酷，尤有所不忍言。就华人之在日本者，亦不甚甘受其辖制。他如澳大利亚、麻六甲、爪哇、槟榔各岛，诸华人岁尚未闻有他故，亦恐未必能久安无事也^{142]}。因此，“若驻领事于此，则上可存国体，下可保民命。^{143]}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大声呐喊：“华民被各国之人苛待驱逐久矣，其他则又何望……此因经理之无法，绥驭之无政也。若经理绥驭果得其宜，则华民兴旺蕃盛之机，实尚在西人之上^{144]}。”

1877年新加坡领事馆后，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又竭力阐述在南洋设立更多领事的必要性和意义，他提出南洋各地“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雇工，或种植，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而“统计全局，只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加以略有添派，岁费当不过十万金，而中国之隐获裨益，奚止十倍百倍。即如新加坡一埠，设立领事以十三年，支

领经费未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所收之款，实已倍之，而商雇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然则保护华民之事，顾可缓乎？^{145]}。1890年，丁汝昌建议在新加坡设总领事，在槟榔屿等地设副领事，得到薛福成的赞同，薛福成为此与英政府积极交涉，并推荐“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足堪胜任^{146]}的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1891年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设立，黄遵宪果然任总领事，为晚清侨务做出重要贡献。

可以说，清人游历笔记从各方面较完整地反映了清代海外华侨社会的真实状况，是我们研究清代华侨历史可资利用的重要史料。

参考文献：

- [1] 蔡永明.中国早期驻外使节与东南亚的华侨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6):80.
- [2][10]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咨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
- [3] 李安山.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2):42
- [4][12] 吴琅璇.王大海与《海岛逸志》[J].社会科学,1996(4):64.
- [5][7][31]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60,10,133-134.
- [6]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序[M].昭代丛书续编,道光癸巳年世楷堂藏版.
- [8] 厦门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志[M].厦门:厦门大学图书馆,1996:374.
- [9][17][18][27][28][34] 谢清高.海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212,236,236,230,238,230.
- [11][清] 王大海.海岛逸志[M].香港:学津书店出版社,1992.7-13.
- [13][14][23][24][37][38][39]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7,128,129,3,6,131,6.
- [15][26][33]张德彝.航海述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0,50-51,142.
- [16][20][21][22][35][42][43][46]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55,131,122,124,154,113-114,110-111,247.
- [19][25][29][30][32][44][45]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12,113-117,116,49,118,259,203.
- [36] 容宏.西学东渐记[M].郑州: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59.
- [40] 刘华.护侨先驱郭嵩焘[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1):71.
- [4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湖南:岳麓书社,1984.420.